



马林：

国共姻缘

引线穿针

国籍：荷兰

生卒：1883~1942

●一位来自苏俄的荷兰籍神秘人物

本世纪 20 年代初，一位名叫亨·斯内夫利特的荷兰籍神秘人物来到了中国。可是，还在他尚未抵达上海之前，各国的使领馆机构和警探人员，就已如临大敌般地向他张开了严密的监视之网。

1921 年 4 月上旬，维也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猖獗一时的奥匈帝国宣告解体。这座素有“音乐之都”美誉的欧洲历史名城，遂成为 1918 年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的首都。

原本，维也纳就是一座春天的城市。名满欧洲乃至全球的美丽的多瑙河，缓缓地从整个市区穿行而过。每临春潮，它那清澈碧透的河水，在明澄瓦蓝的天空的映照下，则变得越发湛蓝而静谧。似乎，它并不是在弯曲起伏的河床上奔腾涌动，而是在约翰·施特劳斯的笔下或钢琴家的琴键上舒缓地流淌、倾诉、欢歌……

这一天，随着数声汽笛刺耳的长啸，维也纳车站驶进一列由 18 世纪生产的那种老式蒸汽机牵引的火车。顷刻，便见成群结队、肩负手提的人流在喧声中涌出了站外。

这时，人流中挤出了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男子。他拎着两只一大一小的手提箱，步履匆匆，旁无四顾，径直地奔向了广场路旁的一辆马车。只听他用浓重的德语向马车夫说着什么，随即便跳上车向东而去了。显然，他并非本地人，单听他那德语发音，便可知是位异邦过客。

按客人的吩咐，马车夫顺利地把他带到了城中东部的一家旅社。随后，客人在旅社登记处要了一间最顶层的单人包房。进了房间，放好行囊，他连一口水也没喝就急匆匆地走了出来——在旅社的门外，那位马车夫还在等候着他呢。

可是，在随后的几天里，令旅社的老板和侍者们大感诧异的是，这位

旅客竟一连数日再也没有回到这里来过。会不会是不结帐而走了呢？不会，因为他那两只皮箱还在房内。那么，会不会是住在此地的亲友家中了呢？似乎也不像，否则他根本便不需要在这里包用房间了。会不会……，不知道！简直搞不懂！老板只知道这位客人是荷兰人，而这还是在他登记时从护照上看到的。不过，自己做的是生意，只要他肯付帐，我何必管这许多呢。

这真是一位奇怪而神秘的旅客！

待到第七天上午，这位奇怪而神秘的客人回来了。不过，不是他一个人，和他并肩走进来的是一位与之年龄相仿的本地男子。更令人惊异的是，在他们的身后，还紧紧地跟进了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察！

事后，这家旅社的老板和侍者们才明白：原来，这些天来，这位奇怪而神秘的旅客竟一直住在维也纳警察局的监房里！那位陪他进来的本地男子是他的一位朋友，而他们身后的那两位警员，是受命专程前来执行任务的——按奥地利政府的命令，立即驱逐这位客人出境，他们的公务是由此地直接押送这位不受政府欢迎的人去火车站，直至把他监送到出奥地利国境线以外的一列火车上。

那么，此公究竟为何许人也？

维也纳警方为什么要拘捕并收监他？

奥地利当局又为什么要将其立即驱逐出境？

原来，他是共产党！而且是刚刚来自苏俄并负有新的使命的著名“赤色分子”！

此公系荷兰人，本名叫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 (Hendricus J. F. M. Sneevliet)。至于化名，则至少有十数个之多。不久前，他在莫斯科时用的化名是马林 (Marling)。在以后，他较长时间使用的化名还有马丁 (Marting)、马灵 (Marling)、马依 (Marreng)、马琳 (Maling)、西蒙博士 (Dr. Simon)、菲力普 (Mr. Philip) 先生、布罗维尔 (Brouwer) 斯列夫利特 (Sleevelet) 等。到中国后，他还有过两个中国化名：一是乐文榘 (Jou Vanson)，一是倪恭卿 (GniKong Ching)。他甚至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中国笔名：孙铎 (Sun-To)。1923 年 7 月出版的中共中央

机关刊物《先锋》的创刊号上面就有他以此署名发表的文章 题为《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所有这些，尚不包括他临时使用一两次的那些连他自己也记不起来的化名！例如，这次他在维也纳这家旅社使用的登记名即是安德烈森(Aadresen)。

实际上，对于他来说，或者像他这类的革命者来说，在不同的各种场合里改一名，换一姓，早已是家常便饭一样的事儿。总之，不惟不足为奇，且完全可以理解和想见。

斯内夫利特于 1883 年 5 月 13 日出生于荷兰著名的海港城市鹿特丹。那里，不论早年及现今，都应是名符其实的世界第一大港。其著名景致有三 郁金香、商船、风车。

马林出身于一个纯粹普通的工人之家。家无恒产，更乏地位。朴实的父母只能用双手养家。他们膝下生有两男一女，斯内夫利特行二。由于生活艰辛，举家艰难，故一家人笃信天主教，以祈仁慈的上帝保佑老少平安。但是，上帝并不每每考虑他们的虔诚和信仰。他们的长子出生后两个月不久 便因病夭折了 女儿出生后 母亲也染病故去 随后 父亲又再婚。这样，童年的马林和妹妹，只好被送到乡下的祖母家，由一位善良好心的婶母带养。

在乡间，从小学到中学，虽然斯内夫利特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亦立下宏愿要去读大学，以一搏知识的阔大海洋。但由于家中亲友确实无力资助，他不得不过早地踏上了闯荡社会、独立谋生的艰难道途。最初，他在首都阿姆斯特丹的铁路中找到了一份工作。此后，他参加了该市铁路电车工人联合会的工作，并由此接触到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

1902 年，在自学了马克思的经典之作《资本论》之后，他加入了荷兰社会民主党。这是他始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致力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之肇端。是年 他仅 19 岁。

1906 年 7 月，荷兰铁路电车工人联合会举行全国大会，23 岁的斯内夫利特当选为联合会常务理事。翌年，兹沃勒市议会竞选，他由荷兰社会民主工党推荐参加竞选，结果顺利当选为该市市会议员。此后，他参与编辑的地方刊物等具体工作。

从参加工人运动起，斯内夫利特就显露出了作为组织者、演说家和鼓动家的才能，这也使他在党内的地位越来越高。1911年，荷兰工会联合会举行特别会议，斯内夫利特被与会者一致推选为全国工会联合会主席。

至此，斯内夫利特已经成为了在荷兰颇有名气的社会主义工人活动家了。人们对他的热情和干练投之以钦服，更对他的年轻和才华抱之以新的期待。

1913年，斯内夫利特刚好步入我们中国人说的“而立”之年。经历了十载荷兰及欧洲工人运动的锤炼，更由于长期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经验，以及他在该项工作中表现出的卓越组织才能，他被指派到遥距万里之外的荷属东印度去从事革命运动。那里，成为了他独立领导革命运动的起点。

斯内夫利特果然未负重望，在殖民地性质的东方荷属东印度，确切地说是在印尼的爪哇岛上，他成功地把那里的以反帝反殖为中心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展起来了，而且还在那里取得了独特的经验。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亲赴被他称为东方的“新麦加”的莫斯科，参加了由列宁全面主持下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由此深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赏识。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内夫利特担任列宁为主席的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秘书。会后，他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如果说，共产国际是世界共产党的话，那么，斯内夫利特便是它的政治局委员了！瞧，此公居然是这么大个儿的人物！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鹰犬们的嗅觉也是极为灵敏的。长时期以来，他们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红都莫斯科，以及在那里所发生和运动着的革命事情，甚至经常或不很经常出入那里的各国革命者的活动及动向，也是在时刻关注着的。因为他们太需要这方面的情报了。

调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应该说，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本性所在，亦是身家性命之所在！

因此，早在斯内夫利特尚未动身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使领馆机构便已侦知到了他的秘密行动，并调动了各地的警探人员对他进行跟踪。

关于此一点，我们借助现已公开了的各方档案资料，便可得到充分的说明。要知道 这些东西 若倒退到 70 年前，我们的故事所发生的那个年代，可都是绝对机密级的文件啊！

现在藏存于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英文档案资料表明，早在 1920 年 12 月，也就是斯内夫利特的这次神秘的东方之行尚未启程之时（彼时他居于荷兰家中），遥在北京的英国驻华公使艾斯顿爵士，便已就斯内夫利特此次东方之行与驻华的荷兰公使欧登科·威廉·亚梅斯取得联系，互通情报，共同监视起了这位自莫斯科衔命东来的“危险赤色分子”。

艾斯顿致欧登科的公函全文如下：

北京荷兰公使

欧登科先生阁下

亲爱的同仁：

兹接我政府电 谓某名为 H·斯内夫利特者约为荷兰人，确已负有在荷属东印度进行直接的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使命赴远东。电报命令我在他向英法驻华公使申请护照的签证时，阻止他得到签证。

我没有关于这个人的任何材料，只知道他约在二年前从荷属东印度到了荷兰。

如果阁下获悉斯内夫利特去申请英国签证的消息并能告知我，我将不胜感激。

你忠实的 艾斯顿

1920 年 12 月 10 日

第二天，在收到此件的同时，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即复函艾斯顿，将他所掌握的有关斯内夫利特的材料及其此次东去的使命等情况详细地告诉了对方。

该函原文如下：

北京 比尔比·艾斯顿

爵士 公使阁下

亲爱的比尔比爵士：

现回复阁下便笺，仅能奉告下述情况：几个星期前，我收到海牙外交部（引者按 此时荷兰政府设在海牙）的一封电报 内称斯内夫利特受莫斯科第三国际派遣，去东方完成宣传使命，电报指示我提请中国政府注意。我已照办并补充说，如果中国当局认为拒绝斯内夫利特在中国登陆是可行的，我将不反对他们这样做。但我迄今尚未得到复函。

如果我能够给你关于此人活动或打算的情报，我定会非常高兴地向你提供。

你忠实的 欧登科

1920年12月11日

显见 此两公函说明 早在 1920年10月，英国政府和荷兰政府都已掌握了斯内夫利特此番东来的情报，并要求其使领馆机构密切注意斯氏行踪 目的显然是一致的——设法阻止该氏此行。因为，包括印度、东印度（即印尼）及中国在内的整个远东地区，都是他们两国的主要殖民势力范围，他们当然要防范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和活动蔓延及此一地区。不仅如此，荷兰政府还将此情报告了中国当局，以收联防之效。

嗣后，荷政府还将这一情况通知给了其在荷属东印度的总督和驻中国上海的总领事馆官员。

正因为如此，我们便也不难理解斯内夫利特在刚刚抵达维也纳后即遭拘捕的原因了。

斯内夫利特是在申请前往中国的签证时被拘捕的。

那日，斯内夫利特离开维也纳城东的那家旅馆后，便踏上马车去了维也纳外事局。当他拿出自己的荷兰护照办理签证时，外事局官员将他和他的护照反复地看了两遍：嗯？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这不正是荷兰大使馆要求阻止其签证的那位吗？于是，该官员找了一个适当的借口，先支走了这位危险的外国人，并叫他两个小时之后来这里取签证。

待斯内夫利特刚走，外事局即派专人把他的护照送到了荷兰驻维也

纳大使馆的办公室上。

大使先生的答复极为明白：“此人是共产党！而且是本政府掌握在册的极危险的赤色分子！”

这样，由于两政府反动立场上的沆瀣一气，当斯内夫利特届时去取签证的时候，当地警察局立即派警员拘捕了他。

“警察先生，我并没有触犯贵国的任何法律条文，请问为什么拘捕我？”斯内夫利特当即抗议道。

“很抱歉 我们是奉命行事。”警察冷冰冰地答道。

这样，斯内夫利特便被投进了维也纳警察局的临时监房。

实际上，斯内夫利特此次途经维也纳，主要是为了完成共产国际交办的另一件事。不然，他若直接去远东和中国，是完全可以不经过维也纳的。

毕竟，这时的斯内夫利特也是老谋深算的革命活动家了。在监房里住了两天后，他便和看守混得熟悉起来了。最后，他通过看守把他被关押在这里的信息告诉给了此地的一位朋友，即前面说到的那位与他一道回旅社取东西的中年男子，他的名字叫弗里德里希·阿德勒。

得到消息，阿德勒即带了一名律师赶到了警察局。这位律师是奥地利人，且在维也纳小有名气。

“请问，你们为什么要拘捕斯内夫利特？”阿德勒上来便是厉声质问。

“我倒要问问 你是什么人？”坐在桌子后面的一位警官毫不示弱。

“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当然，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斯内夫利特的朋友。我要知道的是，你们根据什么把我的这位朋友关进了监房？”

“因为他是共产党！”警官似乎火了。

“好。那么我要问问，你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是共产党？”

警官一时语塞。他确实没有现在可以拿出示人的证据。但该人确实又是共产党，这不是大使先生亲口回复的么？但是，这又不能明说的。

阿德勒见此，便决定步步紧逼：

“警官先生 你别忘了 他是一位外国人——荷兰人！而你这儿恰恰不是荷兰！我的这位朋友只是路过奥地利，他是希望得到去东方中国的

签证。'阿德勒顿了顿 把语调也降了下来：'你应该知道 我的朋友应该属于奥地利共和国的客人。他在维也纳，并没有触犯奥地利的任何法律，你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就拘留一个异乡人士呢？'

警官仍是无言以对，面呈尴尬之相。

“警官先生 我是本地的律师。”说着 那位奥地利律师掏出了一张自己的名片 并伸手向前：“这是我的名片。照我看来 恰恰是你们的行为本身触犯了奥地利共和国的法律 难道不是吗？”

至此，这位警官才觉得形势不对。他清楚得很，按照奥地利法律规定，倘警务人员没有可靠的证据就拘捕本国和外国公民，都是要自负刑事责任的。

最后 他无计可施 只好托出了底牌：“我们的这种做法 只是奉命行事。这样吧，待我请示上峰，或者我们研究一下，再予答复两位。这总可以了吧？”

“在你们没有释放我的无辜的朋友斯内夫利特先生之前，我每天都要到这里来与你们交涉 以表示我们的抗议和不满！阿德勒临行前 又强硬地扔下了一句。

两天后，维也纳警察局终于同意释放斯内夫利特，但同时也把奥地利国家的驱逐令一并掷给了他。

对此 斯内夫利特也好 阿德勒也好 都没啥好说的了——只好接受。于是，接着就出现了上面提到的那回旅社的场景。

1920年4月16日，斯内夫利特离开了维也纳，踏上了东去中国的途程。

5月21日，抵达新加坡。

6月3日 终于抵达上海。

到达上海之初，斯内夫利特下榻于东方饭店 32 号房。第二天，鉴于此行已经暴露，聪明的他一大早就来到了荷兰驻沪总领事馆，并坚持会见了代理总领事丹尼尔斯先生。

这就是说，此后他在中国的活动必须是公开而非秘密的。当然，这种公开，并不是说公开到明白直陈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使华代表，来华就是为

了鼓动和运动革命。

这次，斯内夫利特给自己安排了一种新的角色——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的驻沪记者。

事实证明，斯内夫利特的判断和做法是正确的。——在他被驱逐出维也纳后，维也纳警察局便将其下一步目的地等详情，直接告知给了荷兰驻维也纳公使馆。随后，该使馆又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其它有关国家的使领馆。

一时之间，“音乐之都”维也纳的上空，除了袅袅飘荡的迷人音符之外，更夹杂进了一串串与此大不协调的无线电电波。只是，更多的人并不知道这暗中所发生着的一切罢了。

此外，各国政府及其使领馆机构也全都为之忙碌起来了，这就不只局限于维也纳了。

还是让我再去看看当年那些尘封积久的“绝密档案”吧——

4月20日，也就是在斯内夫利特已经被逐出维也纳赴意大利之后，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致函英国驻华公使艾斯顿通报说：

关于1920年12月11日信中所述之事现可奉告阁下：据海牙外交部来电，斯内夫利特已在维也纳被捕，因他已被驱逐出奥地利，他大约继续前往日本。

4月21日，维也纳警察局致荷兰驻维也纳公使的公函，则把斯内夫利特的下一步行踪描述得更为具体：

如前告知，斯内夫利特持有1918年爪哇所发护照，其上盖有前往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的签证。其他身份证件则一概没有，经验证其身份和雇佣与解雇证明之后，斯不愿在维也纳逗留，遂于1921年4月15日离此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市并拟于1921年4月21日自威尼斯市乘直达上海的火轮继续其旅行。

在上海他将作为一家英国引者按应为日本杂志《东方经济学家》

的记者进行活动。据本警察局所掌握的材料,1921年3月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反军国主义大会期间,曾有传说,斯内夫利特到东方也将为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而建立联系。

这里所说的“1921年3月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反军国主义大会”,是指当时斯内夫利特曾在该会上做过演说,并向与会者介绍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精神等事。

5月17日,荷兰驻印尼总督府一等秘书奉命向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通报说:

“荷兰共产党人斯内夫利特可能在‘阿奎利亚号’轮船上。该船于本月7日从亚丁出发,经过新加坡和香港驶往上海。总督请你报告斯抵沪后的情况,他将在沪逗留抑或继续其旅程前往日本。斯内夫利特的照片以后寄给你们。”

好家伙,人还未到,网就张开了。此外,请再看这份更新鲜!——当时远在海牙的荷兰外交大臣在5月18日致其驻华公使的函电中甚至提出:

“……请将荷兰危险的革命宣传鼓动者引者按:指斯氏,这是多么准确的称谓呀!出现在远东的情况通报中国政府。”

5月30日,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丹尼尔斯分别致函荷兰驻华公使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并通知给了中国警察局和公共租界捕房,向各方或报告或通报斯内夫利特可能的到沪日期,以及预为防范和密切监视的建议。其中,写给荷兰驻华公使的公函中略谓:

鉴于我认为目前尚无理由对此三人(引者按:另二人指斯的朋友巴尔

斯夫妇)立即采取行动,而应首先弄清他们的行动计划是否属实。因此我已经请各有关捕房采取必要措施,对他们的……保持监视。”

好了,我们不需再引了。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斯内夫利特到沪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各国使馆及警探机构还曾专门为共同监视他的活动有过数十次之多的函电往来。这些表明,他们所共同担心的都是一个问题——害怕这位被他们称之为“危险分子”的革命活动家,把苏俄情况及布尔什维主义传及东方广大殖民地地区,以威胁到他们的政治统治和殖民利益。

怕是斯内夫利特本人当年也未曾想到,他的此次东方之旅,竟在世界上引起了这么多的国家政府及其使馆机构、警探人员的关注!

想当时中国政府及上海方面也会在接到这些“友好国家”通报给自己的这些情报后有所安排和布置的。惜乎至今我们还没有见到这方面档案材料,亦未见诸于文献史料的说明。

●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的工作秘书

哦！原来，他就是马林啊！不就是那个直接由列宁委派而来的第一位共产国际使华代表吗？的确，在中国，人们很少知道他的本名，相反却都习惯于用这一化名来称呼他，甚至史籍亦是如此。

目前，在很多介绍性的读物，甚至包括中文的历史文献和研究性著作中，人们都只知道有一位名叫马林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而并不知道斯内夫利特其人 或者 人们总认为这“马林”是斯内夫利特在中国才使用的化名。

其实不然。这化名是他 1920 年首次到东方的“新麦加”莫斯科时使用的。当然，来华后他也更多使用的是这一化名。

在中国古代及近代，曾出了很多以字或号行世的历史名人，以至人们倒忘记了他们的本名，严重到甚至干脆不知道，如苏东坡、孙中山、汪精卫、陈独秀、郁达夫等。不妨 我们且把这里出现的“马林现象”姑称之为“以化名行”罢。（当然 这是专指在中国的情形 因为在当时和今日的西方 各类史籍中仍多用其本名的。）

为照顾读者习惯及行文便当，本书自以下始亦以“马林”这一化名来称这位斯内夫利特先生。由此亦可见积习之惯力也。

马林此次来华，是在莫斯科直接受列宁的委派而来的，其正式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使华代表；具体使命可大致概括如下——

（一）考察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各国的情况并使之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

（二）调查是否可在中国上海筹建一个共产国际联络东方各国的机构——共产国际远东局；

（三）具体帮助中国正式建立起共产党组织。

那么 马林系欧洲人（荷兰籍）又曾在荷属东印度工作有年 他究何

就到莫斯科并在那里深得列宁之赏识呢？他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和背景，那为什么又要派他衔此重大使命而来华呢？

所有这些，说来也是因果相环，此中既有历史的必然，也有时事的巧合。

马林首次到莫斯科并见到苏俄革命元勋列宁，是在 1920 年 7 月间。那时，列宁直接领导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在苏联首都举行。他作为荷属东印度——印尼的共产党团的代表，亲自参加了这次规模极盛的国际大会。

当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模式，苏维埃俄国也才只有不到三年的历史，而作为世界性的国际共产党组织的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距其正式成立则只有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总之 苏联也好 共产国际也好，这时还都是初起和草创时期。

苏俄的社会主义政权在地球上一出现，即刻便遭到来自资本主义世界多达十四个国家的外部联合式的武装干涉，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国内反动的旧俄势力的武装叛乱。尤其当这内外的反革命势力纠合一气，构成里应外合之势时，这新生的尚在襁褓中的苏俄便步入了性命攸关的关键时刻。

虽然我们已然从历史的实际运作结局中确知了这一点，即勇敢的苏俄军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先后击败了这来自内外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夹攻。但在我们所叙故事发生的此一时刻，则正是列宁和苏俄布尔什维克党人举目维艰、拼力苦斗的困难之时。故而，按照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战略构想，乃于 1919 年 3 月成立一个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共产国际。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把它理解成筹划、策动和后来指挥所谓“世界革命”的总部。

倘通俗地来理解，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及其战略总成，在理想追求和终极指向上，似乎可以有宏观和微观之分的。当然，最好是同时收效，一箭双雕，更何况它们在根本上也是一致的。

在宏观方面，它认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方兴未艾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殖民地国家即将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将

两流合一 同时推进 使帝国主义前庭后院一起起火 首尾不能相顾 以达到最后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先哲们的构想——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关于此点，当时的某些欧洲国家已经有了相当的迹象，甚至在德国、波兰等国已经开始了实际的运作。

在微观方面，当东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骤然兴起之时，也正好缓解了帝国主义列强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苏俄武装干涉的威胁。这也等于支持和援助了社会主义的苏俄。而这在利益上，就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来说，又是并行不悖的。

有鉴于当时西欧部分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已成难期之景，所以，作为总部的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领袖的列宁，便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广大东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这就是 1920 年 7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动因所在。

着手解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并制定明确而可行的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工作的总的政策方针及具体的策略手段——这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题。

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的这第二次代表大会与第一次大会在代表来源上有了很大的不同：前一次，主要的参加者大都是欧洲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 而这次 除了他们之外 还广泛邀请了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其他革命性政党的代表。譬如，其中有长期进行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宣传和斗争，最后遭到迫害而避居墨西哥并在那里坚持革命的印度革命家罗易；有以“俄国共产华员局”名义关注着国内反帝斗争的中国代表刘绍周（当时中国国内尚无共产党组织，也不知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还有我们故事中的这位荷兰人士马林先生。

马林怎么又和东方殖民地革命扯到一起了呢？

哦 应该记得 他不是 1913 年就到了荷属东印度去运动革命去了么 要知道 从那时起一直到 1918 年被当地殖民总督下令驱逐出境，马林整整在那里“革命”了五年多呢 而且 更为重要的是 由于长时期的宣传和活动，使他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领导殖民地革命斗争的经验。

所谓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今天我们习惯地简称其为印尼。由于它确实位于印度之东南，十六世纪荷兰殖民主义者远征亚洲并据此地为自己所有时曾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名叫“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机构（实际上是殖民政府），因此殖民者便一直以荷属东印度称之。显然，这是一个带有十足殖民主义色彩的称号。

浮悬于南太平洋万顷波涛之上的印尼，素有“千岛之国”的雅号。梭罗河两岸的沃野及旖旎风光，南洋海岛的亚热带气候，丰富的物产资源，均使荷兰殖民主义者大惠其间，流连忘返。他们就差没有把这些美丽的岛屿移入囊中带回欧洲老家了。

当时，像所有的殖民主义者在其殖民地一样，荷兰人在那里大多是统治者和压迫者。而被荷兰社会民主工党派到那里的马林，却与他们迥然不同。他站在被压迫的“土著人”一边，并成为了当地民族革命运动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初到此地，马林先在爪哇岛上的三宝瓏谋到了一家商会秘书的工作，然后借此开展起了他们要真正从事的革命活动。

不久，总部设于三宝瓏的印尼铁路电车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与马林建立了联系，马林也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由于在荷兰时便长期地领导工会运动，这下他的经验可派上了用场。特别是马林的热情和能力，不断受到联合会众人的推崇。翌年，他被推举担任了该会机关刊物《坚持报》的主编。

此后，由于他的影响和鼓动，该联合会变得更加激进了，并使之由原来被一批欧亚混血儿控制的机构，一跃发展成为了纯印尼人的民族性革命组织。它在印尼工人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后来竟成为了印尼共产党的基本力量。

再后来，马林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还成功地把印尼的另两个有影响的革命组织——东印度社会民主联合会和伊斯兰教联合会——联合到了一起，从而实际壮大了印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殖民主义者的阵营。来华后，马林向共产国际建议把中国当时的国共两党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即源于此。——当然，这是后话。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遥在南洋爪哇岛上的马林，立即著文为之鼓呼，他不顾荷兰殖民当局的反对和压制，四处宣讲彼得堡工人的革命行动，并号召印尼工人学习俄国革命的样子，起来与压迫者作抗争以求其解放。

当然 这是后话。

至此，早便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荷属东印度总督，终于抓到了他文章中的把柄，通缉他，并把他送上了总督府属下的高级法院进行了为期 4 天的公开审讯。但是，马林不惟不惧，反把庭讯当成了斗争的战场，他的那篇著名的庭讯辩护词，竟成了宣传革命的演说辞。

为此，马林丢掉了工作。但是，他在印尼工人中的威信却大大地提高了。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南洋，放弃了作为殖民者高高在上的优越地位 而竟和当地‘土著人’引喉同歌 不惜辛劳 不顾高压 这又是何等的精神呢？此 惟印尼革命者知之殊深也。

待俄国十月社会革命爆发后，马林继续撰文，为之奔走呼号。他甚至在印尼海军大厦组织集会，发表演说，号召水兵们学习俄国同仁，迷途知返，反戈一击。后来，他竟冒殖民当局之大不韪，公开组织了海员与士兵委员会，进行反对荷兰殖民主义者民族压迫的斗争。

完全可以想见 马林的这一系列的言行及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却是荷兰政府和当地总督大人所绝难容忍的。

因此，1918 年 12 月 5 日，荷属东印度总督下令驱逐马林出境。

12 月 16 日，是总督驱逐令生效的最后一天。奉命前来的警察来到了他的寓所，并带来一百多名兵士将其寓所围了个水泄不通。而寓所内，马林正和前来为他送行的社会民主联合会和伊斯兰教联合会的朋友和战友们话别。他不想离开这里，他们也不愿意他离开这里。因为，在这里，有他们共同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斗争方兴未艾，形势如火如荼。而这，又是他们所长期期盼着的，更是他们倾力合作的结果。

无奈，殖民当局不能容忍他。不过，这也正好说明了他们对他的恐惧。

这一天，马林抱着别样情怀，不得不离开了他为之战斗了 5 年多的印